

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洪秋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研討會係由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和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系共同主辦，並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和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提供經費補助，於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假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此研討會共邀請十八位國內、外學者宣讀論文，另邀請百餘位學者參與討論。各篇論文茲分別簡介如下：

吳密察（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臺灣殖民地統治政策與外國顧問 W. Kirkwood〉

1895年由於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領有了台灣，但從此卻也必須面對如何統治、經營新領地的各種問題。由於日本在此之前，並無統治和經營殖民地的經驗，因此西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統治經驗和智慧，便成了日本制訂殖民地統治政策的重要參考、模仿對象。本文作者主要在究明日本在台灣初期統治、經營政策的方案過程中，英籍顧問 William Kirkwood 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提出有關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各種意見。

吳文星（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新渡戶稻造與日本治台之宣傳〉

西方人日本治台觀之建立係本諸直接和間接兩個途徑，即一方面透過來台之西人外交官、技術人員、傳教師、旅行家等之觀察，另一方面則根據日本方面的報導和宣傳。關於後者，日本政府自始即相當重視。日本政府透過印行西文出版品、發行西文期刊雜誌，請官員、學者等撰文，將治台的措施和成果介紹給西方世界。新渡戶稻造是兼具參與台灣經營和宣傳治台成果雙重角色的學者之一，他一則以台灣近代糖業的奠基者而聞名，一則又是向西方人宣傳日本治台成果的要角。關於前一角色已廣為人知，且已有專文詳加討論，惟關於後一角色則鮮為人知。本文作者主要在分析新渡戶如何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的治台政策和施政成果，以及討論其如何宣傳日本治台經驗並辯駁西人之批評。

若林正丈（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

〈一九二三年東宮台灣行啓與「內地延長主義」〉

1923年春，當時的日本東宮皇太子裕仁（以後的昭和天皇）訪問台灣（日文稱「行啓」）。在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中，天皇未曾正式訪問（日文稱「行幸」）台灣，而皇太子的訪問亦僅此一次。因此，在考慮日本的殖民地支配和天皇制的關係時，這次的「行啓」便成了不可不加以檢討的事例。作者假定天皇的行啓，被認為具有「秩序機能」、「教化機能」和「統合機能」三種象徵性的機能。本文即是以上述三種假定象徵性機能，來考察1923年「東宮台灣行啓」這個日本殖民統治史上最大的天皇行事所體現的殖民政府當局的儀式策略，並透過這個考察，試圖描繪在統治已過四分之一世紀時日本關於台灣殖民主義的政治斷層面。

黃富三（臺大歷史系教授）

〈日本領臺與霧峯林家之肆虐——以林朝棟為中心〉

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對二百多年來在台灣拓墾發展、落地生根的台民而言，可說是一晴天霹靂。如何因應此一變局是台民所面對的大難題，其中尤以身為地方領袖的士紳家族為最。本文是作者以清季台灣人中官職最高的霧峯林家（以林朝棟為中心）為例，探討清季台灣重要紳官家族因應日本領台的策略及其演變過程，並略論其得失。

H. J. Lamley（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

“The Yōbunkai（揚文會）of 1900: A Episod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iwan Elite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Rule”

外來民族的殖民地統治能否成功，往往取決於是否獲得被殖民者舊士紳等領導階層的支持和協助，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亦不例外。日據時期，殖民當局即利用保良局等機構來協助其維持治安和恢復秩序。進一步地，總督府為藉由士紳的協助普及新學於民衆，乃於一九〇〇年初，倡設「揚文會」，幾乎網羅了全台具有科舉功名的士紳。本文作者主要在藉由揚文會設立背景、過程等的探討，來究明日據初期台灣精英階層演變的情形。

周婉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講師）

“Renaming Oneself a True Japanese: One Aspect of the *Kominka* Movement, 1940-1945”

日本領台之初，即以「同化主義」為其治台方針，但實則口惠多於實際。及

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後，殖民政府為肆應此一非常時局，乃急於將台灣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而極力推動「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除宗教、社會習俗等的改造外，主要是以「國語運動」、「改姓名」及「志願兵徵召」為三大內容。本文作者以改姓名運動（1940—1945）為研究對象，析論運動初起台人的反應、改姓名人數、參與者背景、改姓名通見之模式、同姓宗親會的介入、運動末期規定的放寬等問題，同時也略及原住民改姓名的景況。

近藤正己（日本近畿大學講師）

〈「創氏改名」研究の検討と「改姓名」〉

1940 年 2 月 11 日，台灣、朝鮮兩總督府同時公布被統治民族的姓名改以日本式姓名的政策。這政策在台灣稱為「改姓名」，朝鮮則曰「創氏改名」。近年，在日本有宮田節子等學者對「創氏改名」加以研究，並獲得相當成果。本文即作者從檢討宮田氏的研究成果及問題點，來探討「改姓名」的實態。在結語中作者指出，本質上「改姓名」與「創氏改名」的出發點是相同的。雖然此一政策的登場背景不同，且一方是由地方做起（指「改姓名」），另一方是由於總督府的意圖（指「創氏改名」），但兩者幾乎是同時期出現的課題，也因此於同日公布施行。

Douglas Fix（美國禮德學院講師）

“Advancing on Tokyo: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1930-1937”

1930 年代初期，在台灣人知識分子間產生的新文學運動，開始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作者首先探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起源，並描述此一運動產生的特殊環境，最後試圖對台灣這一段文學運動做一評論。換句話說，本文的最終目的是欲進一步了解一九三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本質。

柯志明（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Crisis of the Colonial Sugar Industr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digenous Class Structure — Impact and Change in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and Sugar (1925-1942)”

米、糖關係的究明是了解日據時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經濟社會實況的二法門。本文作者將研究焦點置於結構因素，尤其是階級結構方面。階級結構在 1925 年到 1939 年之間，造成了令人驚訝的台灣地主支配的米部門發展模式。作者將米部門的發展模式和 1925 年前日本資本支配的糖部門發展模式對照，在比

較了米、糖二部門的發展模式後，更進一步探究米部門的發展如何加劇米、糖生產間的衝突，及引起以日本糖資本為中心的殖民剩餘榨取機制的危機和社會階層結構的重構。

陳慈玉（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日據時期台灣煤礦業的發展〉

台灣煤炭的開始採掘雖然很早，但大規模的計劃生產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然而效果不大。直到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才在日本殖民地政府的主導下，由財閥和少數台灣本土資本家共同締造了台灣煤礦業的黃金時代（1916-1927）。本文首先探討台灣煤業的發展軌跡，分析影響其發展的外在因素；其次析究煤業內部的產銷結構，以明瞭日本財閥的勢力；再觀察日本煤業帝國中台灣煤業所扮演的角色，即作者是藉由台灣煤業的發展，來了解日本帝國主義中台灣的地位以及財閥與「國家」的緊密關係。

駒込武（日本御茶水大學講師）

〈抗日運動的教育要求和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以1920-30年代台中州草屯庄的事例為中心〉

有關1920年代台灣的抗日運動研究，在日本雖然有若林正文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等重要研究成果，但是以教育的角度來檢討的論著並沒有。本文作者即是以教育為研究焦點，來究明台灣民衆的教育要求與總督府教育政策的頡頏關係。而其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以台中州草屯庄（現在的南投縣草屯鎮）為研究和觀察區域，再利用《台灣民報》的記事，來追溯1920-30年代在草屯庄從事抗日運動的洪元煌的活動。

林瑞明（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亦進入對英美宣戰的決戰體制。《文藝台灣》對殖民當局隨即採取合作的態度；《台灣文學》雖然不敢反戰，但「作品的傾向也考慮了時局，反殖民的主題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台灣人內部結構問題的大家族主義、婚姻問題等」，延伸了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傳統。然而在1942年11月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上，其創辦人張文環「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的驚人發言，將堅守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台灣本土文學傳承，全然逆轉了。我們應如何衡量「皇民文學」呢？又，在戰爭中成長的台灣作家葉石濤於八〇年代皇

民文學的爭論中，曾在一篇短文的結語陳述 1937 年以後台灣文壇的狀況，認為「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從決戰時期的「沒有非皇民文學」到八〇年代的「沒有皇民文學」，我們應如何思考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一段孽緣呢？面對此一嚴肅問題，作者透過《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這兩個對立陣營的作者及其作品，做一深入的比較和分析，提出其獨特的見解。

梁華璜（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日據時代台灣籍民在閩省的活動及處境〉

日本佔領台灣以後，台灣總督府制定了對岸政策，在閩、粵地區培養日本帝國的勢力，而其中台灣籍民所扮演的角色頗為重要，被驅使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岸的馬前卒。

本文是作者從台灣總督府對岸政策中之旭瀛書院及「全閩新日報」的辦理，考查台灣籍民的協力狀況，並試探假冒籍民與典型的台灣籍民，在歷史定位上應有之區別。其次探究台灣籍民在中日戰爭前、後的處境，尤其探究台灣籍民認同危機發生的背景。最後則提及台灣籍民的陰魂（亡靈）在戰後的海峽兩岸所產生的影響。

許雪姬（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日據時期的中華民國臺北總領事館：1931-1937〉

有關日據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設立總領事館的經過，只有吳文星教授在〈日據時期台灣中華會館之研究〉一文中曾探討過。不過領事館的建立並非吳教授探討的主題，故僅將華僑爭取設立領事館一事視為中華會館的主要活動之一，且僅探討到 1931 年 4 月 6 日閉館為止，而未全面探討或評估領事館建立後對僑情的影響及閉館的經過。作者有鑑於此，乃撰文討論總領事館設立運動的背景、設立後領事館所遭遇的難題、領事館與中華總會館間的關係，並探討七七事變後閉館的情形。

顏娟英（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一九三〇年代台灣美術與文學運動〉

本文是作者檢討三〇年代台灣美術與文學發展的過程，尤其側重 1934 至 1936 年的台灣文藝聯盟活動，其主要目的在進一步瞭解現代美術的興起與文化啟蒙、文學運動之間曾有過何種關係？換句話說，這是企圖說明現代美術到底在台灣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占有什麼地位的基礎工作之一。

游鑑明（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助理）

〈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

初等教育是日人教育台民的重點，女子教育又是初等教育的一環，因此公學校台籍女教師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惟以往的相關研究著墨不多，且偏重制度方面的討論。作者有鑑於此，乃採較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本文首先究明女教師的來源及培養，其次分析女教師的人數、任用資格與薪資待遇，並進一步觀察女教師的分布及職務異動。另外，針對女教師的教學服務，檢視其教學活動、管理方式和教學態度是否合於殖民政府與社會的期望，同時並探討女教師的進修情形。最後，作者則析論她們對教育與社會的影響與地位，以明瞭日據時期臺籍女教師的角色功能。

溫振華（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鄉村社會的變遷：以東勢地區為例〉

陳紹馨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對於日據時代台灣社會變遷的分析，雖曾提出其觀點，但仍缺乏較詳細、具體的說明。本文是作者為彌補此一缺憾，以東勢地區為範圍，從行政制度、社會組織之推展與建立的歷程中，來觀察社會的變遷。作者認為，清代後期東勢地區的鄉治組織與總理制有密切的關係。政府的控制力，透過總理制漸漸加強，但仍有其侷限性。地方社會組織是自主性的，以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整合。但到了日據時期，殖民政府的統治一方面透過嚴密的行政系統，控制社會的底層，一方面又透過各種官方監督下的各種「組合」，形成超血緣、小地緣關係的團體，將地方的水利、金融各種資源納於其控制下。具體而言，街庄役場、警察派出所和公學校是改造、控制台灣社會的三大象徵。

黃世孟（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新高港都市計劃與臺中港特定區計劃規劃範型之比較分析〉

探討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都市計劃的歷史，對於都市計劃之近代化研究具有下列三種特殊意義：1. 檢證西方近代都市計劃理論在台灣及日本應用之實際，2. 瞭解殖民統治政權下，政治、經濟、社會面如何影響都市計劃建制及實施，3. 比較台灣光復前後因不同規劃理念所規劃完成的都市計劃。本文屬於第三種研究類型，選擇臺中港（日治時期「新高港」）都市計劃為研究對象。

日據時期台灣史的研究，過去由於某些禁忌和語言等問題，常令學者裹足不

前。近年來，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已大為改觀，日據時期台灣史的研究乃逐漸成爲學者研究的課題。此次會議是第一次以日據時期台灣史爲討論主題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這使得台灣史研究又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們欣見台灣史研究的備受重視，更期待不久之後又能與中外學者共聚一堂，互相切磋研究成果。